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与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现实反思

唐艳秋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4日

摘 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困境与价值扭曲。在智能化与数字化的新时代,这一经典理论并未过时,反而以“内卷”、“躺平”、“数字囚徒”等新形态,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呈现出复杂的现实映照。这些现象本质上是青年在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类本质及社会关系上遭遇多重异化的行为反射与心理代偿。本文旨在通过重释《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构建其与当代青年价值观困境的分析框架,剖析青年“泛卷化”生存状态下的精神症候。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停留在现象规训,而应深入到异化批判与人的复归之根本。因此,需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价值锚点,引导青年超越异化逻辑,通过主体性重建、关系性重构与制度性保障相结合的路径,自觉追求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核心的劳动幸福与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价值观教育的治本之效。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异化劳动, 青年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 内卷, 躺平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Youths' Values

Yanqiu T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26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formulated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rofoundly exposes human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and value distortions under capitalism. In the new era of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ization, this classical theory remains relevant. It manifests itself in complex new forms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such as "involution", "lying flat", and "digital prisoners". Essentially, these phenomena serve as behavioral refle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s when young people face multiple alienations in labor processes, labor products, species-being and social relations. By reinterpreting the four stipulations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linking the theory to the value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youth, and dissects the spiritual symptoms amid young people's generalized involu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go beyond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of phenomena and target the fundamentals of alienation critique and human emancipation. Therefore,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f labor as the value anchor, we should help young people transcend the logic of alien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of rebuilding subjectivity, re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youth can consciously pursue labor happiness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y", so as to achieve fundamental effects in values education.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lienated Labor, Youth Valu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volution, Lying Fla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一个关键枢纽，其中系统阐述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泪控诉，更是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深刻哲学拷问。马克思穿透“国民经济事实”的表象，指认了工人与其产品、与其劳动活动、与其类本质以及与人相异化的残酷现实。这一批判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触及了在物的依赖关系下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

当下，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然而，物质丰裕并未自动带来精神世界的全面充实，部分青年中弥漫的“内卷”焦虑、“躺平”心态以及在数字生活中的迷失，构成了新时代价值观教育必须直面的新课题。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不思进取”或“个性使然”，其背后是劳动意义被消解、人的主体性被遮蔽、发展道路被窄化的深层异化逻辑的现代表征。将《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仅视为经济批判是片面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批判，直接关联人的幸福感与价值观塑造。因此，回到《手稿》，并非进行复古的教条引用，而是激活其批判锋芒与人文关怀，为诊断和疗救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份经典而又鲜活的“思想切片”。马克思主义内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已将异化从生产领域拓展至意识、消费与日常空间；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则把异化理解为承认关系的扭曲，为分析当代精神困境提供了哲学纵深。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黄宗智、项飙等关于“内卷化”的讨论揭示，过度竞争源于评价标准单一与上升通道收窄，与马克思“劳动越多越贫困”的悖论形成结构性呼应。传播学与平台经济研究则

指出,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算法管理和数据提取,使数字劳动呈现“自由表象下的深层控制”,模糊了劳动与生活的边界,构成数字异化的新形态。青年亚文化研究中,“躺平”“佛系”不应被简单道德化,而应视为对劳动意义失落与单一成功标准的症候性抵抗。本研究试图架设一座桥梁,让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哲学批判,与当代中国青年的心灵境遇深度对话,从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从根源上引导青年克服异化,重建健康、积极、创造性的价值观。

2.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与价值观意蕴

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并把握其对于价值观问题的根本性意义,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当前的经济事实”本身,进行层层深入的哲学剖析。马克思的洞见始于一个直观却残酷的矛盾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其自身反而越贫困。这并非简单的分配不公,而是揭示了“异化”这一根植于劳动过程本身的生存状态。首先呈现的是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工人倾注自己的生命力和时间生产出的商品,一旦完成,便立即成为了一种独立于工人之外、异己的客观存在。这个凝聚了工人劳动的产品,非但不归其所有、受其支配,反而转变成一种外在的、疏远的强大力量,反过来与工人对立,甚至统治工人。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工人为自己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和享受的部分就越少,他所遭遇的异己的物的世界就越强大。这种关系的彻底颠倒,导致劳动价值的本源被遮蔽: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其成果非但不是对自身力量的确认,反而成为了否定自身、奴役自身的工具。它在价值观层面埋下了“物的逻辑高于人的逻辑”的种子,为拜物教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然而,异化绝非仅仅停留在劳动的结果上,它更深刻地渗透在劳动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这便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对工人而言,劳动不再是内在本质的需要和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成了一种外在的、被迫的强制。劳动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否定;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在劳动中感到的不是归属,而是疏离;唯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于是,劳动这一本来确证人之为本质的活动,被贬低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不得已手段。当劳动失去了其本真的、属人的性质,沦为了痛苦的谋生工具时,任何关于劳动尊严、创造光荣的价值论述,在个体的直接体验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这从根本上割裂了劳动与幸福、奋斗与意义之间的天然纽带。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马克思将批判引向了更深的哲学维度,即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也即本真意义上的劳动——是人之为本质的根本特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它意味着人能够超越直接的肉体需要,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身内在的目的,能动地、全面地去改造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直观自身、发展自身。然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这种彰显类生命的自由活动,被彻底贬低为仅仅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生活——这种本应通向无限可能和全面发展的领域——变成了维持个体动物性生存的工具。这意味着,人丧失了自己之所以为本质的根本依据,他的生命活动变得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无本质区别。从价值观的视角看,这种异化导致了一种深刻的“降格”:人从一种追求无限可能性的、目的性的存在,被压缩和扭曲为一个追求狭隘生存的、工具性的存在。人生的丰富维度、多元追求和超越性理想,在异化劳动的结构性框定下,极易萎缩为对职业竞争、技能变现等单一赛道的疲于奔命。

自然而然,上述三重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第四重规定——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应当由自身指导生产活动。当一个人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疏离时,他也必然与其他人相疏离和对立。在异化劳动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并非以完整的、丰富的“人”的身份与他人相遇,而是戴着“劳动者”或“占有者”的抽象面具彼

此对待。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情感性的、丰富的社会联系，被间接的、冰冷的、算计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竞争关系所中介和取代。他人不再被视为休戚与共的伙伴，而是潜在的竞争者、剥削者或是被利用的资源。这种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从根基上侵蚀着团结、协作、同情与信任等社会性美德的生长土壤，催生出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式的心态。这种人际关系的异化，不仅是个体孤独感的源泉，更是“内卷”式非理性竞争的社会关系基础，它使得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与集体行动变得异常困难。

马克思所揭示的这四重规定，并非彼此割裂的清单，而是一个环环相扣、逐步深化的有机整体。它从可见的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主体内在的生命体验，再追溯至人之存在的哲学根基，最终展现其普遍的社会后果。这一理论勾勒的，是一幅从外部世界到内部世界、从个体生存到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图景。它告诉我们，价值观的扭曲与困境，其根源往往不在于抽象的观念灌输不足，而在于产生和塑造这些观念的现实生活过程本身发生了异化。因此，要破解当代青年的价值观迷思，就必须握紧“异化劳动”这把锐利的手术刀，去剖析他们所处的真实劳动境遇与生存状态。唯有进行这样一场彻底的诊断，我们后续关于价值观“复归”之路的探讨，才能避免流于空洞的道德说教，而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本。

3. 异化劳动逻辑下当代青年的价值观风险探析

《手稿》中马克思劳动观的当代价值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挖掘完善的[2]，倘若说《手稿》中的理论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副精密的镜片，那么透过它来审视当代青年的生存境遇，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一幅陈旧的历史画卷，而是一幅细节愈发复杂、色彩愈发矛盾的当代图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逻辑并未因技术的飞跃而失效，相反，它在智能化与数字化的新时代找到了新的宿主，并以“内卷”、“躺平”、“数字囚徒”等极具时代特色的症候，在青年群体中展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变异性。这些现象绝非孤立的情绪发泄或简单的代际标签，而是异化劳动结构在当代生产关系中的具体映照，其背后是青年在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类本质及社会关系上遭遇的多重异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价值观危机。

3.1. “内卷”：作为异化劳动恶性竞争形态的价值观扭曲

“内卷”已成为解码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关键词。从本质上看，“内卷”是异化劳动在存量竞争社会结构下的恶性竞争形态与精神内耗状态。它首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青年们被卷入一场高强度的、持续的劳动投入，但这种劳动日益脱离其创造与发展的本真目的，异化为在封闭系统内争夺有限稀缺资源的纯粹手段。劳动过程充满焦虑、压抑与被迫，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只要外在强制一停止，人们就想逃避它。当“奋斗”被狭隘地等同于“竞争”，其内涵便被彻底掏空，沦为一种恐惧驱动的、旨在维持不被淘汰的机械重复。这种异化在平台经济中体现得尤为赤裸，例如外卖骑手，随着劳动者贡献的日益增多，平台资本的收益也随之水涨船高[3]，他们的劳动过程被算法精确控制，送达时间成为刚性约束，迫使骑手在系统压力下超速骑行、牺牲休息，彻底沦为“算法囚徒”，劳动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与此同时，“内卷”更是“人与人相异化”的极致表现。在零和甚至负和的博弈逻辑下，同辈、同事之间本应存在的互助、协作与共情，被异化为高度的警惕、算计与潜在的敌对关系。个体被原子化为孤立的竞争者，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异化不仅摧毁了劳动集体中的温情，更在价值观层面催生了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伦理。团结、协作等社会性美德失去土壤，成功被定义为对他人有限份额的掠夺。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精神悖论：青年在行动上极度“投入”，却在精神上深感“虚无”与“无意义”，因为他们的劳动并未指向自身本质力量的壮大与对象化，而是消耗在无止境的内部竞争中。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使得青年难以建立起对劳动本身的内在热爱与崇高感。

3.2. “躺平”与“低能量生存”：作为异化劳动消极抵抗的价值观疏离

与“内卷”的过度投入形成镜像的，是“躺平”及“低能量老鼠人”、“牛马”等网络自嘲话语的流行。这绝非简单的懒惰或颓废，而是对异化劳动体系的一种非暴力的、消极的哲学抵抗。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这种认识既是片面的，又是伪善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对人的彻底否定^[4]。当青年感知到劳动投入与回报严重失衡，当“奋斗即正义”的叙事在残酷的异化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时，“躺平”便成为一种退出恶性竞赛、通过降低欲望与消耗来捍卫最后主体性与生活尊严的策略性选择。它直接回应了“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既然劳动无法带来幸福与自我肯定，反而带来痛苦与否定，那么最小限度的参与甚至退出，便成为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

在价值观层面，“躺平”表现为对主流成功学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主动疏离与拒绝。它质疑以财富、地位为单一标尺的人生评价体系，挑战“人被物所奴役”的生存状态。然而，这种抵抗的悲剧性在于其退缩性与个体化。它放弃了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实现自我的可能，本质上仍是异化结构压迫下的被动反应，并未通往真正的解放。因此，它极易滑向价值观的虚无主义与消极避世，即承认异化的不可撼动，并以收缩自我的方式与之共存。这同样无助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反而可能使青年在“清醒的绝望”中丧失改变现实的勇气与想象力。

3.3. 数字劳动异化：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新危机

数字技术的全域渗透，催生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形态，也使异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致化与隐蔽化形式，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更为无形而深刻，构成了全方位的“数字异化”。

首先，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数据的商品化与剥削。青年日常的浏览记录、社交互动、地理位置等数字痕迹，作为他们无意识或半意识下生产的“数据产品”，被平台资本通过用户协议无偿占有、加工并垄断。这些本应属于劳动者自身的数字产品，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强大的支配力量：平台利用其进行精准营销、行为预测，甚至通过“信用评分”等系统决定青年个体的社会经济机会。青年作为生产者，不仅无法控制这些产品，更无法分享其产生的巨大价值，注意力经济便是典型，用户的注意力被商品化出售，但创造者却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

其次，劳动过程的异化在算法控制下登峰造极。无论是外卖骑手的送餐路线，还是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派送，或是内容创作者的流量导向，其劳动节奏、强度乃至内容本身，都日益被不透明的算法逻辑所支配。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对算法指令的被动响应。平台经济常将劳动者归类为“个体工商户”，以此规避劳资责任，实则将其置于更不稳定的境地。更甚者，数字技术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生活的时空边界。工作通过移动设备侵入生活的一切间隙，导致“生产过劳”，青年即使在休憩时也难以摆脱工作的潜在召唤，生命时间被资本无形地征用。

再者，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数字时代更具欺骗性。即便是创作、分享、社交这些本应最具自由与创造特性的活动，也被平台资本吸纳进增值轨道。短视频创作者为了迎合算法推荐的“流量逻辑”，可能放弃艺术表达的初心，将创意简化为对“完播率”、“点赞数”的算计，使创造性活动沦为“工具性操作”。数字劳动的高度标准化、碎片化，使青年难以在其中积累复杂的专业技能或获得可持续的职业成长，劳动无法成为实现类本质的途径。青年在虚拟世界中精心构建“人设”，却面临自我认知消解的风险，陷入“单向度的数字生活”。

最后，人际关系的异化表现为社交的“平台中介化”与情感联结的虚空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人与人之间的

直接、丰富的社会交往，被评分系统、关注列表、算法推荐墙所中介和量化。社会信任被简化为“五星好评”，情感联系被矮化为数据交换。在虚拟的赛博空间中，看似万物互联，实则个体被禁锢于“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中，加剧了精神的孤独与社会的疏离。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却使劳动者在虚拟空间中的原子化竞争加剧，彼此视为生存威胁，共同体意识难以形成。

综上所述，当代青年面临的“内卷”、“躺平”与数字生存困境，并非彼此割裂的现象，而是同一异化逻辑在不同条件下的症候群。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危机：在技术加速演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劳动这一人之为人的本质活动，正与青年的幸福感、意义感和主体性加速剥离。异化不仅剥夺了他们当下的劳动尊严，更深刻地威胁着其健康价值观的塑造——当劳动与痛苦、算计、虚无相连，关于奋斗、创造、协作的正面价值叙述，便极易失去现实的根基与感召力。劳动应是人对自己的肯定，属于人本质的“内在的东西”，但是却在现实层面表现为否定自己的“外在的东西”[5]。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面的、严峻而复杂的现实之境。

4. 基于异化劳动批判的青年价值观路径重构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劳动解放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人类解放[6]。面对异化劳动的新形态及其引发的价值观风险，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作表面化的鼓励或批评，而必须以《手稿》的批判精神为指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劳动幸福”为终极目标，进行系统性的路径重构。

4.1. 重释劳动本质，筑牢“劳动幸福”的价值观基石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思想中完成一次彻底的价值澄清与重建，必须拨开异化劳动所笼罩的迷雾，让劳动的本真光芒重新显现，这要求我们系统地向青年阐释清楚“异化劳动”与“本真劳动”的根本区别。我们要明确指出，马克思所激烈批判的，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扭曲的、敌视人的“异化劳动”，而非劳动本身。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并将“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本真的劳动，定义为人的类本质和最高层次的幸福源泉。通过这种辩证的讲解，可以帮助青年将自身对“内卷”的疲惫、对“躺平”的向往，从对劳动本身的否定性情绪，转化为对造成异化的社会条件与生产关系的理性批判，从而保护他们内心深处对创造、对实现自我的真诚渴望。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引入“对象性活动”这一深刻的哲学视角，超越将劳动仅仅理解为谋生手段的功利化解读。应当向青年阐明，劳动是人将内在的认知、情感、意志与智慧等本质力量，通过实践对象化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自然，也确证和发展了自身，建构了生活的意义与世界的历史。这种阐释能为青年对抗劳动的工具化、碎片化提供坚实的哲学依据，让他们理解，为何一种能体现其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会带来如此深刻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最终，这一价值奠基必须与时代语境紧密结合，链接新时代倡导的“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以及通过诚实劳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观。要讲清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如何与国家的创新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同频共振，引导青年将自身的劳动融入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从而获得超越个体焦虑的、深厚的意义感与使命感。

4.2. 开展批判性认知教育，揭露异化机制的当代伪装

价值观的稳固离不开清醒的认知。在信息爆炸、算法支配的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赋予青年一双“慧眼”，培养其批判性思考能力，使其能够识破异化劳动各种精致的新伪装。因此，应当推动开设以“数字素养与批判”为核心的课程或工作坊。这类教育决不能止步于教授办公软件或编程技能，而必

须深入“算法识读”与“平台批判”的层面。要带领青年剖析推荐算法如何塑造信息茧房、平台如何通过数据商品化进行隐秘剥削、游戏化机制如何操控用户行为、消费主义广告又如何制造虚假需求。例如，可以解剖社交媒体如何将人的社交需求转化为可测量的“互动数据”并用于盈利，让青年明白“流量”背后的资本逻辑。这种祛魅教育，旨在帮助青年在数字生活中保持主体性的清醒，从被动的“用户”转变为具有反思能力的“数字公民”。

同时，教育需要直面“内卷”与“躺平”这类热点社会心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冷静解剖。要引导青年共同分析，“内卷”现象背后是教育资源、优质岗位等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分配结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要讨论“躺平”作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症候，其反映的是哪些结构性的压力与期望管理困境。这种分析旨在将青年个体的情绪体验，上升为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理性认知，避免简单的个人归因或道德指责，从而培养其从宏观结构理解微观困境的社会学想象力。此外，传统的职业生涯教育也需要进行价值转向。它不应再是单一地教导如何获取高薪职位，而应引导青年探索如何将个人的兴趣、潜能与社会的真实需要相结合，寻找那些能够更大程度实现人的“对象性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领域与工作方式，为未来投身一种更具解放性的劳动做好思想准备。

4.3. 构筑扬弃异化的实践空间，以现实实践实现人的本质复归

价值观的真正塑造，最终依赖于积极、正面的实践经验。要对抗异化，最有力的方式就是让青年在受教育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体验一种接近“本真劳动”状态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教育体系内创设一系列“非异化”或“弱异化”的实践场域。在教学方法上，应大力推广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与创造性实践。减少机械性的知识灌输与重复练习，设计那些需要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自主发现问题、合作制定方案并创造性地产出成果的课题。当一个小组的学生为了制作一部反映社区历史的纪录片而共同策划、采访、拍摄、剪辑时，他们所经历的劳动过程，就更接近于自由自觉的、充满主体性的对象化活动，能直观地感受到创造带来的成就感、掌控感与意义感。

同时，要鼓励并制度化地组织青年参与具有明确社会意义的生产性实习与社会服务。无论是深入乡村的科技支农、扎根社区的公益服务，还是在企业参与解决一个真实的技术或管理难题，这类实践能让青年的劳动与具体的人、真实的社会需求直接相连。在服务与贡献中，劳动的社会性、合作性与价值感得以鲜活地呈现，这能有效对抗“人与人相异化”，重建劳动的情感温度与社会认同。此外，教育者应积极支持青年基于真实兴趣与共同志趣组建各类社团与自组织，如科创社团、读书会、艺术工坊、公益合作社等。在这些以内在兴趣和共享价值而非功利竞争为核心的“自由人联合体”雏形中，青年能够体验平等、协作、互助的人际关系，自由发展多方面的潜能与兴趣，这正是在为“人的类本质”的复归提供一片宝贵的实验田和微型社会土壤。

4.4. 倡导制度保障与文化培育，营造抑制异化的整体环境

青年的价值观塑造绝非教育系统能够独自承担的任务，它需要一个抑制异化逻辑、鼓励人的发展的社会整体环境作为支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立德树人”的同时，也应涵养青年的公民意识，引导其关注并参与营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劳动环境。我们应倡导并支持构建真正尊重劳动者的制度环境。这包括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抵制“996”等将过度加班合理化的畸形文化，推动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薪酬分配与晋升体系，保障青年劳动者在职场中的基本尊严、时间主权与发展权利。从源头上压缩异化劳动肆意滋生的制度空间，是任何价值观教育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

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引导青年关注并参与数据权益、算法伦理等前沿公共议题的讨论。鼓励他们思考：个人数据产权应该如何界定？算法决策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如何保障？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边界在

哪里？将青年自身的“数字困境”与宏观的制度建设、社会治理联系起来，能培养他们超越个体境遇的、建设性的批判思维与行动能力。最后，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营造一种“多元成功、崇尚创造”的新文化。通过媒体、文艺作品、公众舆论等多种渠道，塑造和宣传各行各业中通过诚实劳动、创新劳动实现个人价值并贡献社会的榜样，打破“唯学历、唯薪资、唯地位”的单一、僵化的成功评价体系。只有当社会文化为青年展现出丰富多元、色彩斑斓的人生可能性与价值实现路径时，他们才更有勇气和底气去拒绝异化劳动的单一剧本，去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充实而完整的幸福生活。

这条从价值到实践、从个体到社会的“复归之路”，其最终目标是指向青年主体性的觉醒与解放。它旨在引导青年认识到，克服异化并非要否定劳动与奋斗，而是要改变劳动的条件与性质；不是要逃离社会，而是要改造那些造成人与人相疏离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最深沉的使命，便是赋能青年，使他们从异化结构的被动承受者与消极抵抗者，成长为清醒的批判者与积极的创造者，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中，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生命的本真意义。

5. 结束语

21 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讨论，从哲学领域延伸到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回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我们与马克思完成的，不仅是一次理论的温故，更是一次面向时代难题的求索。异化劳动理论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青年“内卷”中的焦虑、“躺平”下的无奈、“数字生存”里的迷惘，其核心均是劳动意义的迷失与人的主体性危机。这些并非青年一代独有的“瑕疵”，而是在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叠加下，异化逻辑的现代表征。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若想真正触达青年心灵，引领其价值观健康发展，就必须勇于承接《手稿》中的批判锋芒与解放旨趣。它不能是围绕异化结果进行修修补补的劝导，而应是旗帜鲜明地指向异化根源，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旗帜的复归之旅。这条路径要求我们：在价值上，重倡劳动幸福论，夯实意义根基；在认知上，赋予青年批判的武器，识破异化新装；在实践上，创造本真劳动的体验，复归人的类本质；在环境上，推动抑制异化的制度建设与文化营造。在劳动这一过程中，人获得的不仅是生存资料，还有自我的实现，劳动不再是自然给人的强制规定，而是人的享受，人的自我实现和解放在劳动中得以完成[8]。

最终，教育的目的是引导青年认识到，克服异化并非要逃离劳动，而是要改造劳动的条件与性质；不是要否定奋斗，而是要追求一种将人的创造性、社会性与自我实现融为一体的“本真奋斗”。唯有如此，青年才能从“异化劳动”的被动承受者与消极抵抗者，转变为“自由劳动”的自觉追求者和积极创造者，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真正书写属于自己并贡献于社会的、充满意义与幸福的人生篇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穿越时空的思想力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深沉的使命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2] 陈露露.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劳动观及当代价值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银川: 宁夏大学, 2025.
- [3] 张子玥. 数字劳动者主体性危机: 表征、成因与应对——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J]. 黑河学院学报, 2025, 16(11): 23-27.
- [4] 汪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再审视[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2): 93-103.
- [5] 冉力文, 成龙. 重思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90-97.
- [6] 吴晓妮. 浅析《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解放思想[J]. 南方论刊, 2024(9): 41-42+50.
- [7] 郑天喆, 王平.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当代诠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8] 李欣依. 劳动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4(9): 9-13.